

荀子選注



前 言

广大工农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法批儒，注释法家著作，是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今天评注《荀子》，就是要以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作指导，认真总结历史上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一 荀况所处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奴隶起来造反。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奴隶制的社会基础，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同时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新兴地主阶级作为

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登上了历史舞台，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到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先后掌握了政权，确立了封建制，一个统一的中央封建集权制国家即将形成。但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当时各诸侯国的割据局面，利用他们打进地主阶级政权的代理人作垂死挣扎，妄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因此，复辟与反复辟、分裂与统一，就成为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反映在思想领域里，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反对革新前进和新兴地主阶级主张革新前进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怎样有效地巩固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制的复辟？怎样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中国？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新兴地主阶级从理论上给予说明，这也是时代向这个阶级提出的历史任务。荀况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思想代表，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又称荀卿或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先秦杰出的法家代表，是法家的思想家、理论家。他曾在齐国稷下（今山东省临淄县西）讲过学，担任过楚国兰陵（今山东峄城东）的地方官。荀况曾在赵国进行考察，在赵孝成王面前

与临武君辩论军事问题，阐述自己的法家军事思想。他为了研究和总结商鞅等前期法家的斗争经验和思想理论，还毅然决然地到秦国作实地考察，对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备加赞扬，认为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晚年，他定居楚国的兰陵，进一步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验，特别是法家与儒家斗争的经验。他一生写了不少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文章（后收入《荀子》一书，现存三十二篇），宣传自己的法家思想，对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新兴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确立思想统治，巩固封建专政，实现全国统一，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 荀况的法家思想

荀况在和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与儒家思想相对立的法家理论。

哲 学 思 想

“制天命”还是“尊天命”，这是战国末期荀况

与儒家在哲学思想方面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

“天命论”是孔孟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儒家学派的理论支柱，是阻碍社会发展、为奴隶主反革命复辟势力服务的反动精神武器。孔孟之流把“天”说成有意志的，要人们相信奴隶主头子是秉承天意，代天统治人民的。在他们看来，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封建政权，是“逆天”，而他们复辟奴隶主专政，才是“顺天”。

荀况针对儒家的“天命论”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的思想。他认为天是物质的，没有意志的，它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并且不受任何人主观意志支配。荀况由此进一步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他得出结论：“治世”与“乱世”，“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天论》）就是说，人世的治乱兴衰，与天不相干。这是非常明确的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指出：“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荀况论天，实质是论人，批判“天命”，是为了打倒奴隶主复辟势力，树立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权威。

荀况在批判“天命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这一人定胜天的战斗口号。他认为天管不了人，人却能管天，人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变

化情况，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这就为新兴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提供了理论根据，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

在认识论上，荀况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他说：“形具而神生”（《天论》），先有人的形体，然后才产生人的精神。又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他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也是可以被认识的。他还进一步阐明了人的认识过程中，思想与感觉的关系。他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正名》）荀况在这里明确指出了人的感觉器官反映客观事物的作用，思考要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他又认为“知之不如行之”，“行之，明也。”（《儒效》）荀况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孔孟“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把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荀况针对孟轲鼓吹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他举出了许多例证，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好利而恶害”是人的本性，而“性善”是后天学习、改造的结果，并从“人性恶”的观点出

发，论证了实行法治路线、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他说：“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荀况的“性恶论”深刻揭露了奴隶主阶级的凶残本性，撕下了儒家假仁假义的面纱，为新兴地主阶级制定法治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

列宁说过，哲学上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荀况与孟轲在哲学思想上的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政治斗争。荀况的唯物主义哲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和发展政权，特别是在上层建筑中加强地主阶级专政，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由于荀况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虽然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但他看不到劳动人民是“人定胜天”的主人，看不到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他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与我们今天讲的“人定胜天”还有根本的不同。他在强调思考（理性认识）的重要性时过分夸大了“心”的作用（“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解蔽》）。他的“性恶论”虽然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离开人的阶级性去谈人的善恶，仍然跳不出抽象的、超阶级的人

性论的圈子。因而荀况对孟轲“性善论”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

政 治 思 想

荀况在与孟轲一伙复辟势力的斗争中，依据革新前进、厚今薄古的进步历史观，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的政治主张。他说：“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苟》）“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桀然者矣，后王是也。”（《非相》）他认为历代最好的治国办法也没有现在的好，只有后王的办法是最正确的，一切应以当今为标准。荀况指出孟轲一伙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的“俗儒”，其目的是“略法先王而足乱世”，同时他还告诫新兴地主阶级，“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儒效》）荀况这种厚今薄古的政治思想，是对孟轲“法先王”复辟倒退反动谬论的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

在荀况的著作中，“法后王”的思想是非常突出的，但他屡次提到“法先王”。应当指出，他的“法先王”是为“法后王”服务的，他说：“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王霸》），“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性恶》）其目的就是要从先王的治国办

法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这是同他革新前进的法治路线一致的，和孟轲的“法先王”有本质不同。

“隆礼”、“重法”是荀况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所讲的“礼”，是针对孔孟的“礼治”、“仁政”，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提出的政治概念，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上层建筑。从荀况全部思想来看，他对“礼”作了新的解释，赋予“礼”以新的阶级内容，其中包括封建等级制度、道德标准等内容，这与儒家主张的“礼”有着本质的不同。荀况认为，礼是法的根本，法是礼的保证（“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只有通过法治，才能使“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王制》），建立起新的封建统治秩序。有时荀况又认为“礼”就是“法”（“非礼，是无法也”《修身》）。法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东西，“法者，治之端也”（《君道》），“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致士》）。荀况的“隆礼”、“重法”就其阶级实质来讲，是为了镇压没落奴隶主阶级反革命复辟活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

荀况看到当时“天下不一，诸侯俗反”的分裂割据局面，容易被奴隶主复辟势力用以颠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反复辟斗争，巩固政

权，他系统地论述了“一天下”的政治主张，并为新兴地主阶级统一中国制定了纲领路线和政策。荀况认为法治路线必须靠人去推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道》），因此他主张按照地主阶级的政治标准来选拔人才，“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王制》）；“外不避仇，内不阿亲”（《成相》）；“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这就有力地否定了奴隶主政权的世卿世禄制，批判了儒家的复辟倒退路线。

荀况的“法后王”、“隆礼”、“重法”、“一天下”、“尚贤使能”等思想，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法治路线。

但是，荀况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他把封建制度看成是完美无缺、永恒不变的，将“与万世同久”（《王制》），暴露了他的形而上学观点。他的“法治”主张，虽然在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政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成了压迫劳动人民的根据和手段：他认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对于君主的作用，荀况把他说是“民之原也”（《君道》），同时又夸大剥削阶级

“圣人”、“君子”的作用，这些反映了他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经 济 思 想

为了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巩固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荀况继承了商鞅等法家的“耕战”思想，坚决反对孟轲“复井田”的复辟主张，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封建经济的纲领和措施。他主张“农分田而耕”（《王霸》），
“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礼论》）。这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废除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剥夺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把他们的财产和权力进行再分配，为巩固和发展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有效地反对奴隶制复辟，提供了理论根据。

荀况认为发展封建制经济，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是执行“隆礼”、“重法”的政治路线，而关键是发展农业生产。他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天论》），
“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富国》）。荀况在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深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展生产，繁荣国家经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在强调“强本”的同时，提出了“节用”的思想。“节用”就是节省开支和消费。他认为

“开源节流”、“节用裕民”（《富国》）是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根本措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富国》）。

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在荀况的经济思想中，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政裕民”（《富国》），他主张运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力量，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来保证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达到巩固封建所有制的目的。他还在具体经济政策上提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富国》）的主张。荀况的这些经济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它深刻地批判了孟轲之流在经济上的复辟谬论，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对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一天下”的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荀况所主张的“以政裕民”，是为巩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他的经济思想，除了有剥夺奴隶主阶级经济权力的一面，还有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一面，在主观上决不可能也决不会为广大劳动人民着想。

此外，荀况的军事思想，与儒家也是根本对立的。荀况在他的《议兵》等篇中明确提出：“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公开申明地主阶级的军队是暴力工具，是镇压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工具，是为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变法、巩固政权、实现统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肯定了进步战争的作用。他提出一条与儒家以礼治军相对立的以法治军的军事路线。认为只有“赏重”、“刑威”、“政令信”、“权出一”，才能做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在教育思想上，他强调要为法治路线服务，要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人才，要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辨，散儒也。”《劝学》）。他明确提出要向新兴地主阶级的优秀人物学习（“以圣王为师”《解蔽》，“学莫便乎近其人”《劝学》），要向实际学习，坚决主张“师法之化”，反对闭门读书，提倡身体力行。荀况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教育上的表现，是对儒家鼓吹的反动教育思想的有力批判。

三 总结历史经验，为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荀况的思想和理论是

战国末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专政的斗争经验的总结。

荀况在他的文章中，论述了“隆礼”、“重法”的重要性，并把它贯穿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这说明制定和执行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夺取政权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巩固政权也同样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

荀况主张在镇压没落奴隶主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必须批判各种“奸言”、“邪说”。他对儒家反动思想清算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上层建筑，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强化封建政权。

荀况在经济上的一系列主张，反映了夺取政权后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粉碎奴隶主复辟活动，重视运用政权的力量，巩固封建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

荀况反对“诸侯异政”的分裂割据局面，主张“一天下”，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这一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有力地打击了搞复辟、搞倒退、搞分裂的反动势力。

荀况研究理论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新兴地主阶级当时面临的反复辟、巩固封建专政的问题，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思想武器。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断历史。”

研究荀况的思想，总结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专政的斗争经验，对于我们加深理解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在肯定荀况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的思想和理论还存在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除了前面已指出的外，突出的就是关于吹捧孔丘的问题。

荀况所处的时代，正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激化的大变革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荀况正是在同孟轲之流的斗争中，从儒家的营垒中分化出来

的，但是他毕竟是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他所主张的又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儒家思想对他仍有一定的影响。他对儒家的经典虽有所批判，但仍主张学习要“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孟轲之流反动思想的批判上，但没有看到孟轲的反动思想来源于孔丘，同前期一些法家相比较，在这一点上，他有很大的弱点。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在评价荀况时，必须把他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他的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用全局统帅局部，分清主流和支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路线上划清法家与儒家、革命与反动、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界限，才能对他的进步作用，作出必要的、历史的肯定。

目 录

前 言

天 论	(1)
王 制	(24)
性 恶	(65)
解 蔽	(91)
正 名	(122)
非十二子	(152)
正 论	(172)
非 相	(206)
儒 效	(228)
王 霸	(265)
强 国	(304)
天 子	(326)
君 道	(334)
臣 道	(364)
致 士	(380)